《名公書判清明集》審判思想體系論介

鄒濬智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書判最早大概見於西周,發展於漢魏兩晉,成熟於唐宋。南宋出現了宋代唯一的一部判詞集——《名公書判清明集》。該書由南宋自號「幔亭曾孫」者所編,共分十四卷,分為官吏、賦役、戶婚、人倫、人品,懲惡六門,加上附錄,記載書判五百餘篇上下,皆出於當時名士之手。書中所收既可展現宋代法律在社會中的操作實況,也反映出執法者的法律文化理念。透過該書,不只能認識當時廣大民眾法律生活的真實樣貌,而若將之與其他史料對照,更能有效解讀宋代乃至中國古代法律現象的深層文化脈絡;是以迄今已有不少學者據之進行審判、法律思想相關研究。

然因所見限於部分書判門類,各家研究成果總無法概括《名公書判清明集》之全部,加以臺灣學界對其關注較少,因而筆者擬依舊有研究成果為基礎,以書判本身為軸心,宏觀論介《名公書判清明集》思想體系,建構當時執法人員審判思想大概。

關鍵詞:書判、法律史、審判思想

綱目:

壹、代前言:西周到南宋前書判的發展

貳、《名公書判清明集》其人其書

參、《名公書判清明集》的審判思想勾勒

肆、代結論:《清明集》對中國法律史研究的重要性

伍、引用書目

壹、代前言:西周到南宋前書判的發展

書判之發展大致產生於西周,發展於漢魏兩晉,成熟於唐宋,完善於明、清兩代。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於外界及其自身發展的原因,判詞不斷變化,在不同的時期又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現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最早判詞是 1975 年在陝西省岐山縣發現的西周晚期青銅器「朕匜」上所刻的一段銘文,銘文引述了主審官伯揚父針對被告牧牛所作的判決。判詞分層論證,逐步加深,很有分寸,已

¹ 本文曾以〈《名公書判清明集》審判思想體系試構〉篇名,於第一屆技專校院通識教育「博雅與融整」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17年10月26日)宣讀,感謝講評人提供寶貴意見,今就講評意見修訂後發表。

經初步具備了後世判詞的基本面貌。2

到了秦代,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判詞,但是在 1975 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答問》,其中某些條目裡面已經出現了明確的案情、案件的過程、最後的判決等說明³,頗接近後世的判詞。

真正的符合嚴格定義的判詞見於漢代,《史記·酷吏列傳》記載到: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垂。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 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內,勒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 後,湯為長安吏,久之。

從這則記載可以看到漢代審理案件的大致流程為:「傳爰書,訊鞠論報」。其中「爰書」早見於秦簡法律文書,並一直沿用到了漢代,指的是供詞,而「鞠」字原本是動詞,指訊問真相,這裡名詞化,指的則是判詞。根據漢代的司法流程,案件審理結束後要「讀鞠」——宣讀判詞;如果當事人或其他人不服判決,聽完鞠後可以要求審查或上訴,即「乞鞠」。為了減少乞鞠,獄吏書寫判詞時皆力求嚴謹,讓當事人難以反駁。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法律形式都逐步完善,判詞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只可惜留傳下來的判詞甚少。到唐代,判詞進入成熟期,與前代相比,大約有千餘篇判詞流傳下來,並出現了像張鷟《龍筋鳳髓判》和白居易《白樂天集·甲乙判》這樣的判詞集,這兩部書也是研究唐代判詞的重要資料。宋太祖建宋以後,重新恢復書判拔萃科(後曾兩度置廢),雖然在規模和重視的程度上無法與唐代相比,但以判取士的制度卻被沿用了下來。由於書判拔萃科的重置,判詞的寫作又再度受到士人們的重視。南宋出現了宋代唯一的一部判詞集——《名公書判清明集》。書收判詞五百道上下(含附錄),皆出於當時名士之手,並且全為散文判詞,革除了先前駢體用典的陋習,風格上與北宋、唐代判詞形成鮮明的對比。4

貳、《名公書判清明集》其人其書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法律方面,宋初所定《宋刑統》、南宋中期的《慶元條法事類》(殘本)及《宋會要輯稿》中的法律規定,今人多加以研究。但有關制度性的規定,不僅傳世數量少,而且未必能從這些有限的傳世文獻中看出當時法律實踐的具體狀況。所幸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名公書判清明集》全本被發現並得到點校、出版,為研究南宋中後期法制、尤其是司法實踐提供了寶貴資料。

《名公書判清明集》又稱《清明集》或《清明錄》,南宋自號「幔亭曾孫」

2

² 銘文記錄伯揚父指責牧牛不守誓言控告上司。但伯揚父再三減輕其刑,改科罰锾,希望牧牛可以改過,否則加重其刑。宣判完各項文書交各管存查。詳見來固,〈我國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西周青銅器朕匜銘文〉,《法學雜誌》,1981年2期,1981年。

³ 李學勤等,《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頁225。

⁴ 有關判詞的演變,詳可見高超,《余靖判詞與宋代判詞的發展流變》,廣州:暨南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者所編,書分十四卷,分為官吏、賦役、文事、戶婚、人倫、人品,懲惡七門,加上附錄,記載書判五百道上下5,時間分布上,基本屬南宋寧宗後期和理宗時期;地域上,主要屬於南宋的江南東西路、福建路、荊湖南北路和兩浙路。6書名中的「名公」二字指這些書判作者均為顯赫當時的名士;「清明」二字據明刻本刊印者的〈後序〉,指的是「明無一毫之蔽,清無一點之污,然後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為聖人。」

《名公書判清明集》(以下簡稱《清明集》)所收書判既可展現宋代法律在社會中的操作狀況,也可以反映出影響執法者的法律文化和思想——書判交融著當時社會成員的法律認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評價。透過該書,不只能認識當時廣大民眾法律生活的真實圖景,而且與其他史料對照後,更能有效解讀宋代乃至中國古代法律現象的深層文化機理。7

版本方面,《清明集》目前存有南宋刻本(殘本)與明隆慶三年盛時選刻藍印本(即《大典》輯本)。南宋刻本《清明集》(殘本)現藏日本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民國初年張元濟編《續古逸叢書》將其影印錄入。是書共存八冊,不分卷。書前有序文一篇,但文句斷缺,難以辨認內容,只可略知序文乃編者「幔亭」作於南宋景定辛酉年(即景定二年)。由此推知其書約刻於南宋景定二年。此書序文後附有「清明集名氏」表,開列朱熹、蔡久軒等人及其籍貫,供閱讀此書參考之用。從所錄姓名看,均為南宋管轄南方各地當時有名士大夫。此版之流傳於明朝以前的情況已不清楚,明初入藏內閣,正統年間錢溥《秘閣書目》有所著錄,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十四「政書」亦載:「《清明錄》一部八冊,閱。」隆慶末年,高拱、張四維等人參與重抄大典,張氏從中輯出《清明集》,推想其時內閣所藏原本《清明集》已經流失。8

參、《名公書判清明集》的審判思想勾勒

由於《清明集》係晚見且十分貼近當時法律活動的古文獻,已吸引不少學者研究其審判、法律思想。然因所見限於部分書判門類,各家研究成果無法概括該書之全部,加以臺灣學界對其關注較少,因而筆者擬依舊有研究成果為基礎,以書判本身為軸心,宏觀論介《清明集》的思想體系,如下。

一、兼顧法、理、情而致中和

《清明集》的中和思想主要體現在判決結果儘量符合「法」、「理」、「情」的衡平。將「法」、「理」、「情」三者相比較,「法」與「理」、「情」二者最大的區

⁵ 其中無名(不署名)書判有一百二十一例,詳參柳立言,《《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無名書判〉,《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5期,2011年。

⁶ 王志強、〈《名公書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學研究》、1997年5期、1997年,頁118-134。

⁷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 年 13 期,2013 年, 百 39-40。

⁸ 版本演變詳見張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版本及流傳〉,《圖書館雜誌》,2001 年 7 期,2001 年 7 ,頁 5-57。

別在於它源於國家制定,無論官員是就字面還是就其意蘊上運用法條,都不得超越法律條文自身的界限;理兼指「道理」和「天理」;「情」則指的是基於儒家「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推而廣之的「人情」。在「法」、「理」、「情」三者之中,「法」與「理」、「情」之間常有抵觸,而「理」、「情」往往站在同一陣線。對於宋代實際參與法律活動的官員而言,一般善良的庶民對法律的理解遠不如對「理」、「情」的體認來得深刻清楚,故宋代司法官員於判決之中不得不考慮協調「法」、「理」、「情」三者,以求妥適結案。9

由於宋代沒有終審制度,判決睽諸「法」、「理」、「情」三者,符合中和,也是為免庶民反復上訴,消耗行政資源,在某種程度上可視做追求息訟、止訟(詳下)。所宋代官員處理獄訟時必須採取據「法」援「情」而合於「理」的「中和」策略:法律是司法審判的「常經」,而「理」、「情」則是讓判決結果能為庶民所接受的「權變」。宋代的司法審判往往呈現出這樣一種權不離經、經不離權,以經統權,以權補經的態勢,在此態勢之下,「法」、「理」、「情」三者各有其位而致中和。10

分論之,以「常經」——合於法律而論,《清明集》中所載判詞多有「在法」字樣,計九十四筆。¹¹在法禁詳備的南宋,法律的規定理應是處理糾紛時的首要考慮因素,如,〈吳肅吳鎔吳檜互爭田產〉一案:

准法: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吳檜所齎干照已經五十餘年,其間破碎漫滅,不明已甚,夫豈在受理之數?

本案中審判官對吳檜契據的真實性提出幾點疑問,並具引法條,明確判決吳檜爭產不合法律規定。

以「合理」而論,最典型的判詞為〈張運屬兄弟互訴墓田〉。對於同一個祖 父的張氏兩兄弟為爭墓田而互訟一案,審判官員勸告雙方應:

各歸深思,翻然改悔,凡舊所讎隙,一切湔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氣之義, 與門戶之重,應憤悶事一切從公,與族黨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 睦,天理昭著,他日自應光大,不必計此區區也。

分析案情時,判官自然夾雜了一種道德上的評價——「理」,而且大多數人都會 認為符合道德的判決是公正的。

以「合情」而論,《清明集》所載判詞中,多見宋代司法官員以人情勸諭鄉

期,2013年6月,頁277-328。

⁹ 柳立言指出:「天理與法律的關係、應分兩個面相來分析:一是對受害者權益的維護,二是對加害者行為的懲罰。在前者,天理與法律平行而彌補其不足,沒有導致司法的不客觀、不確定或不一致。在後者,為了縫補受害人和加害人彼此的天倫,天理有時凌駕法律,以道德訓誨代替刑罰。」詳見氏著,〈「天理」在南宋審判中的作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卷2

[®]峻,〈《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宋代司法審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 1 期,2010 年 ,頁 140-143。

本文所引各索引結果及傳統文獻原文多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以及其他常見之資料庫如「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寒泉」(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等,原文部分標點略有調整,下不另註。

民之舉,如胡穎在〈鄉鄰之爭勸以和睦〉便說:

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無橫逆之事,昔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眾共 相與遮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仇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 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 里,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

《清明集》中,「情」是一個最為重要的觀念,其被司法人員提起的頻率甚至比 法要高出許多,幾乎在每一個案件中司法官員都提到了或用到了情。¹²

以「理」、「情」等社會規範作為案件判決依據時,與法律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並且相互統一。所以《清明集》中,多有明確引述法條,卻以其他結果對判決做出權衡的例子。傳統思想認為興訟並非美事,「無訟」往往代表一個地方官盡到了教化職責,若訴訟增加,則通常會被認為地方官員不稱職。因此地方官會千方百計息訟¹³;為了息訟,衡量「法」、「理」、「情」顯得特別重要。由於案情的變化多端不能為法律所囊括,需要借助法律以外的「理」、「情」來解決法律所不及的情況。¹⁴雖然法治國家要以法律為標準,但是法律和道德(「理」、「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兩者結合,才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¹⁵

二、 敦親睦鄰,族罪從輕

承上,執法睽諸「理」、「情」,「理」、「情」的適用又優於「法」,此舉與儒家的仁政思想脫離不了關係。兩宋雖然法令完備,但君臣上下仍然強烈主張禮樂教化治國——「德主刑輔」、「大德小刑」。因為儒家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判決上就更加強調宗族內的和睦以及自我內部的調節,不能事事訴諸刑責。臻其極致,非但不予收坐罪名,也有引咎自責未盡法律教育義務的。中國古代社會是農耕經濟,大多數民事糾紛發生在宗族鄰里之間,一旦發生衝突,宗族鄉鄰輕易可以從中加以調解。宋代的許多家族法規都要求親族之間發生糾紛後不能直接到官府提訴,而必先由族長來裁斷是非曲直。在《清明集》中,這類案例也不在少數,如真西山在勸諭事件後的官府公文中,認為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監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可見依靠國家法律爭取個人權利固然重要,但無論何都必先讓家族尊長出面處理才行。16

因為許多族內糾紛在族內已由家族尊長處理,所以《清明集》所收、發生在宗族間的悖亂倫常的惡性刑事案件很少,常見以一般民事訴訟和輕微刑事案件為

 $^{^{12}}$ 陳銳,〈宋代的法律方法論——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中心的考察〉,《現代法學》,33 卷 2 期,2011 年 3 月,頁 36-47。

¹³ 廖建翔,〈論宋代的『訴訟』文化——從《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息訟」說去〉,《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卷1期,2013年,頁90-92。

¹⁴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年13期,2013年, 頁 39-40。

¹⁵ 朱禹、任樣佳、王茜茜,〈探析《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無訟」思想——以親屬間訴訟為視角〉,《法制與社會》,2014 年 8 期 (上),2014 年,頁 105-107。

¹⁶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年13期,2013年, 頁 39-40。

主;輕微刑案讓「睦族」、「仁政」等懷柔手段更顯得實用。書中名士之一的朱熹 就曾表態:

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讎, 遂失鄰里之歡,且虧恥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 如此,己足傷暖。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 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 切徒以柱後、惠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晦菴集》)

就算書判入選《清明集》最多的胡穎,因「好殺」而見聞於理宗,其書判亦可看 出他主張族內和睦。如其所經手的〈兄弟侵奪之爭教之以和睦〉:

大凡宗族之間,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興,未有乖爭而 不敗。蓋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孫,血氣骨脈,自呼一源。若是伯叔兄弟 自相欺凌,自相爭關,則是一身血氣骨脈自相攻相克。一身血氣骨脈既是 自相攻相克,則疾痛病患,中外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聖賢教人,皆 以睦族為第一事,蓋以此也。

《清明集》編者十分重視家族關係,書中人倫門所分父子、母子、兄弟、夫 婦、孝、不孝、亂倫、叔侄、宗族、鄉里等十類,就有九門直接與家族有關。族 內爭執的判決,除適用儒家化的法條外,有時還直接援引倫常來斷案。¹⁷早在先 秦時期,孔子就提出君臣父子的理想社會秩序,孟子也有人倫之說;迄漢儒,提 出「三綱六紀」;唐律一準乎禮;兩宋時期,法律因循其舊。理學興起,強調重 新高舉傳統倫常的旗幟,整飭社會風俗;尤其是孝悌之道的本體地位,是理學的 重要特色,也是書判的理論依據。不僅如此,民俗和慣例等在調解民間活動中亦 佔有很大比例。¹⁸

甚者,還有為了顧及倫常,而判刑輕於法定刑的情況,如胡穎所經手的〈母 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

當職心實忿焉,從其母之所請,刑之於市,與眾棄之矣。早間其母又執至 其父遺囑,哀矜惻怛之情,備見於詞意間,讀之幾欲墮淚,益信天下無不 慈之父母,只有不孝之子。罔極之恩,馬圭雖粉骨碎身,其將何以報哉! 但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詞,而其母亦復惻然動念,不勝舐犢之愛,當職 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為母子如初歟!今更不欲坐馬圭之 罪,押歸本家,懇告鄰舍、親戚,引領去拜謝乃母,友愛乃弟,如再有分 毫干犯,乃母有詞,定當科以不孝之罪。

《清明集》對族內犯罪的輕刑,是理學繼承者們的為政手段。對一般案件不崇尚 刑威,客觀上有利於緩和政府和平民之間以及平民內部、特別是家族內部矛盾, 對於社會的安定,發揮不小作用。19

¹⁷ 王志強、〈《名公書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學研究》,1997 年 5 期,1997 年,頁 118-134。 18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年13期,2013年,

頁 39-40。

^{*} 王志強,〈《名公書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學研究》,1997年5期,1997年,頁118-134。

三、 止訟息訟、小事化無

中國自漢代以來「息訟」思想一直是儒家官員所宣傳和主張的。而統治者也認為喜歡訴訟是民有爭心的表現,對維護統治秩序十分不利。雖然名公們也都知道訴訟無法從根本杜絕,但他們為無訟所做的努力,是盡可能使爭訟雙方心悅誠服,消除再訟隱患;同時強力打擊健訟之徒。承前文,名公們致中和、敦親睦鄰都是為了止訟。透過對《清明集》中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南宋時期「健訟」社會環境下²⁰,名公們並沒有拒接或積壓案件,而是通過「法」、「理」、「情」相結合,進行最有利的處置,過程中體現「無訟」思想的本質內涵——即及時公正有效地處理案件。

《清明集》中有法意明確而以息事寧人為由,變通處理的書判,如〈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黃臻已立十有八年,子母相安,終始無間,乾當門戶,祗奉差役,增置田額,並無一毫顯過。其次伯廷新、廷壽連年延師訓迪,主盟婚對,初未嘗有異說。近因廷新、廷壽相繼之亡,阿毛、黃臻遂失所倚。廷珍之子黃漢龍乃起吞謀之心,關合廷珍,興訟不已。其意只欲逐黃臻而自立耳。……黃臻為廷吉之子,既三歲以下異姓聽收養之法,又合夫亡妻在之法,止立黃臻,不立禹龍,可也。前提舉但以黃廷吉薄有家產,利所在,小人所必爭。是以又於黃氏子孫之中,亦立一人,以塞諸黃之意,而息其訟。

如有少寡守節並合法立繼者,事經十八年而族人圖財爭為立繼,官府儘管對寡婦知禮守節表示讚賞,闡明其原所立繼合法,且財產亦屬其所有,但卻仍又再立其 侄為嗣,就是為了息訟。²¹

又有〈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

婚男嫁女,非小事也,何不詳審於議親之初?既回定帖,卻行翻悔,合與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縣,更自推詳元判,從長較議元承,並勸劉穎母子,既已興訟,縱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見,只宜兩下對定而已。今晚更無定論,不免追人寄收。

已許嫁女兒悔婚,依法應處以杖責,女追還,而判官認為既「已興訟,縱使成婚, 有何面目相見」,要求由親鄰勸和,調解處理。

名公們推敲考察每個案件的情節,為兩造之間維持或恢復良好關係,以及為 重建社會秩序,超越為單一個案考量,作出妥適判決²²;採取調解手段,既能滿

²¹ 有關宋代各種繼承及共財制度造成的糾紛官司,可參柳立言,〈從法律糾紛看宋代的父權家長制一一父母舅姑與子女媳婿相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卷3期,1998年9月,頁483-556。關於婦女立嗣的決定權,係夫>婦>族長,詳可參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圖書,2001年4月。

²⁰ 劉馨珺,「南宋獄訟判決文書中的「健訟之徒」〉,《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3 期,2001 年 7 月,頁 29-69。

 $^{^{22}}$ 崔明石,〈事實與規範之間:情理法的再認識——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考察依據〉,《當代法學,2010 年 6 期,2010 年,頁 3-11。

足各方的需求,也是希望糾紛能一次解決。23《清明集》中的無訟,很多情況下 都採調解做法,並隱隱遵循以下三條原則:第一、適用調解的案件,一般都是普 通的民事糾紛和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第二、雙方必須自願,所以在判決書中常 能看到「如或不悛,定當重置」等警告自願和解而翻悔,必有懲罰的詞語。第三、 調解成功之後各給事由。「各給事由」類似今天的調解書。「事由」既是調解案件 結案的一個程式,也是當事人爭訟結束和對調解認可的依據。²⁴

追求無訟,除了以調解為主要手段,還表現在地方官對興訟的嚴格控制和健 訴訟者的懲治措施上,這也是好訟的民間風俗和非訟思想衝突的必然結果。²⁵為 了抑制興訟,宋代律法對興訟期限有嚴格限制;提訟若是以下犯上,更有嚴厲處 罰。²⁶而對無故興訟或教唆興訟者也有強烈的處置,如捕治其尤、杖一百等等。

四、 法律宣教,重教輕罰

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古代中國,我們看到法律的宣傳、教育功能被推向 了極致,完全淪為宣揚道德的手段,以致對法律本身的獨立價值造成了衝擊。自 幼需熟讀儒家經典才能進人仕途的中央、地方各級官員,在審理案件時遠遠不滿 足於只做一個止息紛爭的法官,他們還致力於通過執行法律,對民眾進行教化。 這種現象在中國存在已久,可稱之為儒家的法律宣教傳統。28

儒家歷來重視教化的力量和功效,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借日常教化之 力, 收潛移默仆之功。[南宋] 謝維新就說:

古者法疏而犯法者寡,後世法密而犯法者眾,此其故何哉?蓋古者學校之 設,教化之行,人知廉遜,恥於為非,井地之均,衣食之足;後世則不然, 井地破而穀祿不平,學校廢而習俗不美,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雖刑 辟日報而不為沮止,此其所以不古若也……毋亦教化,其救世之大務歟? 謹毋曰:「但求詳於法而已矣。」(《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宋儒非常推崇教化,尤其在南宋中後期的理學家及其門人進入仕途之後,更 加重視法律宣教29,在審理案件中無不關注對當事人的教育。如《清明集》中〈子 未盡孝當教化之》:

子盗父牛,罪當笞。至於不孝一節,本州當有以教化之,豈可便行編管。

²³ 賴坤發,《中國傳統法律場域無訟觀之研究——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例》,頁 65-69,嘉義: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 張利,〈「義理決獄」探析――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依據〉,《河北學刊》,26 卷 2 期, 2006年3月,頁108-112。

²⁵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年 13期,2013年, 頁 39-40。

²⁶ 郭星華,〈無訟、厭訟與抑訟——對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法社會學分析〉,《學術月刊》,2014 年9期,摘要。

鬥劉馨珺、高明士、《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圖書,2005年7月),頁492-493。

²⁸ 陳小葵,〈正人心,厚風俗——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儒家的法律宣教傳統〉,《連雲港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16卷3期,2003年9月,頁5-9。

²⁹ 陳鴻彝,〈宋代的法治宣教 〉,《中國法治文化》,2016 年 7 期,2016 年,頁 58-60。

送州僉廳,且將彭明乙枷項日程,仍令日設拜其父,候父慈子孝,即與踈放。

審理此案的蔡杭站在教化的立場上,僅對兒子罰枷,若兒子盡孝即解枷。又蔡杭在另一起訴訟案中的判決:

送縣照已行戒約。但子之於母,自宜孝順,於母所敬亦敬之,而況所謂外 公者乎! 田業固不可逼賣,至於一二家事之類,亦何足道。監下替彭宣教 讀《孝經》一月。帖縣喚上徐立之來問,限三日。

對因強迫外公賣田而被訴之官府的兒子,則採取了判罰讀《孝經》一個月的做法。 蔡杭對子盜父牛和兒子逼外公賣田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法,但都突出了以教 化為主的特點。如果對這些侵犯尊親權益的卑幼依法嚴懲,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 果,甚至會影響家庭內部的關係。因此,蔡杭採取了教化與懲罰相結合的方法, 以達到父慈子孝、和睦親族的目的。

從《清明集》大量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名公」們為達到敦厚風俗、和睦親 族這一理想境界,在處理爭訟時,無不以教化為先。於此,〔南宋〕胡太初曾有 過肯定評述:

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虧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 (收入石地《誡子孫書》)

《清明集·後序》中對諸名公的評價,於此也是正面的:「今觀集中,於民詳於勸,於吏詳於規,大都略法而崇教,其忠厚好生,瀁然在目。」³⁰

名公們大力提倡儒家重視家庭倫理的主張,對關係人倫案件的處理,往往以教化為先,懲罰在後,以美風俗、厚人倫為為政之根本,可謂儒家思想的忠實衛護者和積極踐行者。³¹名公們自認所扮演的不僅是法官的角色,更是一個「先知覺後知」的教化者。對普通百姓而言,「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南宋〕楊萬里《誠齋集·刑法論》)法就是刑,民眾平日裡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司法官僅僅嚴厲地依法裁判而不是藉道德加以開竅,是難以達到良好的教化效果的。更何況嚴格依法裁判有時還容易激化對立。³²所以名公們多用調解手段以教化黎民、息訟寧人;從這裡也可看出宋朝理學家義利觀(儒家之義與功利可以兼得)在司法中的深遠影響。³³

肆、代結論:《清明集》對中國法律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國傳統審判、法律思想中,法律的實現始終沒有成為根本目標。在法哲學

 $^{^{30}}$ 張利,〈「義理決獄」探析——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依據〉,《河北學刊》,26 卷 2 期,2006 年 3 月,頁 108-112。

³¹ 劉小明,〈《名公書判清明集》,所見南宋親屬間訴訟〉,《唐山學院學報》,25卷5期,2012年9月,頁52-54。

³² 張利,〈「名公」司法審判精神探析——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依據〉,《河北法學》,24 卷 10 期,2006 年 10 月,頁 144-149。

³³ 鐘海濤,〈宋代的義利思想的法律影響——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的案例說開〉,《商雜誌》,2016年24期,2016年,頁228。

的層面,法律僅僅是一種工具,它的價值不在於條文表面的內容,而在於其深層的原則。法律的作用僅在於實現這些原則。這種工具主義的法律價值觀使法律本身的內容和邏輯被輕視或忽視。禮儀教化、春秋微旨、道義人情,反而成為各個特定時代執行法律時,必須分別需要考慮、兼顧的要素。34

進入北宋,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司法機關的干預和監督日趨頻繁,司法的得失與政治的成敗緊密相關;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重義輕利的傳統有所改變,各級官僚士大夫比較關心與老百姓有關的小事,重視法律的執行。因而在判詞的整理方面,出現了兩種新的現象。第一種現象是士大夫將前代明敏斷獄、平反冤案的記載彙集成書,並據以參考,代表作有鄭克的《折獄龜鑑》和桂萬榮的《棠陰比事》等。它們取材於正史和筆記,不僅對研究古代司法活動而且對現代偵查破案、判罪量刑也有一定參考價值。35第二種現象是士大夫將自己的判詞收集保存起來,甚至編入自己的文集,傳之後世。譬如《宋史·范應鈴傳》記載,范氏曾先後作過崇仁縣知縣、廣西和浙東提點刑獄,有《對越集》四十九卷專收其判詞(《對越集》雖已失傳,但《清明集》中收有他的書判)。到了南宋中後期,上述兩種現象合二為一,標誌就是《清明集》的問世。36

透過本文的爬梳,我們得到了一個宏觀的《清明集》審判、法律思想體系:追求中和、重視人倫、止訟息訟、法律宣教。對今日司法如何在執行當中能消弭紛爭、取得社會和諧,具有參考價值。

此外,張晟指出《清明集》對中國法律史研究還有以下幾個重要意義37:

其一、《清明集》囊括了眾多官員的行政文獻,**對全面瞭解宋代行政機構如何運行,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今日犯罪學研究者們對古代的法律法制存在偏見,認為無處是冤案,實在無可取之處,這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完整的瞭解古代社會與政府的運行情況是研究與評價古代治理犯罪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所謂的認識都是片面與主觀的。

其二、《清明集》所收案例涉及當時當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將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極端衝突矛盾都展現出來,**充分揭露了宋代社會、尤其是城市生活方面的資料**。這對瞭解宋代社會的司法執行與市民生活,特別是法律層面的權利義務

³⁴ 王志強、〈南宋司法裁判中的價值取向——南宋書判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6期、1998年,頁117-130。

[&]quot;從書名來看,《折獄龜鑑》就是指書的內容要做為斷獄者的借鑑。全書輯錄上起春秋戰國,下到北宋政和年間關於平反冤獄的案例故事近三百條、三百九十餘事,編者鄭克在按語中對大部分案例故事也進行了分析和考辨。本書最大價值在於較有系統地總結了前人在司法方面所積累的歷史經驗,對今人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棠陰比事》則是桂萬榮在《折獄龜鑑》的基礎上,進一步從正史、野史、名人筆記中採集一些案例,以對仗比韻的形式編輯而成;雖然沒有像《折獄龜鑑》用按語的方式對案件進行評述,但是其中許多案例通過實地勘驗、調查案情原委,取得確鑿證據,對中國古代犯罪偵查的貢獻反倒要比《折獄龜鑑》來得高。另可參鄒濬智,《《折獄龜鑑》

與古代犯罪偵查——代表案例之分析與古今合證》,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 ³⁶楊翠蘭,〈論宋代法律文獻的編纂成就〉,《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7卷12期,2006年12月, 頁31-34。

³⁷ 張晟,〈中國犯罪學的研究方向〉,《中國商界》,2008 年 9 期,2008 年,頁 188-189。

行為,提供了很多重要資訊。

其三、《清明集》所收判例很少使用花俏文字,基本採用平易的散體古文, 且嚴格執行著三段論寫作——法律規定、事實,處置——格式,**內容的可信度很** 高。雖然三段論使得判詞閱讀起顯得枯燥無趣,但是這也說明了**文**字間所反映出 來的歷史不夾帶人為做作,十分真實。

做為一本晚近才被整理出版的中國中古重要法律文獻而言,《清明集》確實 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探索研究才是!

伍、參考文獻

一、專書

- 1. 李學勤等,《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 2.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 東大圖書,2001年4月。
- 3. 鄒濬智,《《折獄龜鑑》與古代犯罪偵查——代表案例之分析與古今合證》, 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
- 4. 劉馨珺、高明士、《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圖書、2005年7月。

二、期刊論文

- 1. 王志強,〈《名公書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法學研究》,1997年5期, 1997年。
- 2. 王志強、〈南宋司法裁判中的價值取向——南宋書判初探〉,《中國社會科學》, 1998年6期,1998年。
- 3. 王迪,〈《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古代法律文化研究〉,《知識經濟》,2013年13期,2013年。
- 4. 朱禹、任檬佳、王茜茜,〈探析《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無訟」思想—— 以親屬間訴訟為視角〉,《法制與社會》,2014年8期(上),2014年。
- 5. 來固,〈我國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西周青銅器朕匜銘文〉,《法學雜誌》,1981年2期,1981年。
- 6. 崔明石,〈事實與規範之間:情理法的再認識——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 考察依據〉,《當代法學》,2010年6期,2010年。
- 7. 張升,〈《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版本及流傳〉,《圖書館雜誌》,2001年7期,2001年。
- 張利、「名公」司法審判精神探析——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依據〉、 《河北法學》,24 卷 10 期,2006 年 10 月。
- 9. 張利,〈「義理決獄」探析——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依據〉,《河北學刊》,26卷2期,2006年3月。

- 10. 張晟,〈中國犯罪學的研究方向〉,《中國商界》,2008年9期,2008年。
- 11. 柳立言、〈「天理」在南宋審判中的作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卷2期,2013年6月。
- 12. 柳立言,〈《名公書判清明集》的無名書判〉,《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5期,2011年。
- 13. 柳立言、〈從法律糾紛看宋代的父權家長制——父母舅姑與子女媳婿相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卷3期,1998年9月。
- 14. 郭星華、〈無訟、厭訟與抑訟——對中國傳統訴訟文化的法社會學分析〉、《學術月刊》,2014年9期。
- 15. 陳小葵,〈正人心,厚風俗——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儒家的法律宣教傳統〉,《連雲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6 卷 3 期,2003 年 9 月。
- 16. 陳銳,〈宋代的法律方法論——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中心的考察〉,《現代法學》,33卷2期,2011年3月。
- 17. 陳鴻彝, 〈宋代的法治宣教〉, 《中國法治文化》, 2016年7期, 2016年。
- 18. 楊翠蘭、〈論宋代法律文獻的編纂成就〉、《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7 卷 12 期,2006 年 12 月。
- 19. 廖建翔,〈論宋代的『訴訟』文化——從《名公書判清明集》中的「息訟」 說去〉,《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卷1期,2013年。
- 20. 廖峻,〈《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宋代司法審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期,2010年。
- 21. 劉小明,〈《名公書判清明集》,所見南宋親屬間訴訟〉,《唐山學院學報》,25 卷5期,2012年9月。
- 22. 劉馨珺·〈南宋獄訟判決文書中的『健訟之徒」〉·《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 33期,2001年7月。
- 23. 鐘海濤、〈宋代的義利思想的法律影響——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的案例說開〉、《商雜誌》、2016年24期、2016年。

三、學位論文

- 1. 高超,《余靖判詞與宋代判詞的發展流變》,廣州:暨南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7年。
- 2. 賴坤發、《中國傳統法律場域無訟觀之研究——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例》、 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四、資料庫

- 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
- 2. 「寒泉」,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 3.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ii.htm。